

朝阳区百子湾路《神木谣》碑与黄木庄地区的工业史迹

近日，笔者寻访原北京钢琴厂内乾隆帝御书《神木谣》碑，该碑在黄木厂路1号院4、5号楼之间一座新建重檐六角攒尖亭中。亭子覆黄琉璃瓦，坐北朝南，坐落在汉白玉石阶上。亭子南面右侧置朝阳区文物保护单位标识。黄木厂路北面的京秦铁路上，时有火车隆隆驶过，激发了我书写黄木庄地区工业史迹文化之兴。

黄木庄原为皇木场。据史料记载，明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下诏书，派遣工部尚书宋礼采伐木料营建北京的皇宫和长陵。一次，宋礼在四川省大凉山（今沐川县）西二十里的黄种溪山一带发现了一批特大金丝楠木，喜出望外。但在欲采伐的前一天晚上，忽然雷声大作，这批金丝楠木竟

随着远去的雷声消失了。一时间，宋礼急坏了。待第二天一看，这批巨木却都漂浮出山谷，抵达江上。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宋礼急速将此事奏报朝廷，明成祖十分高兴，以为“此乃祥瑞之兆，天助我也”，随即命名这批特大的金丝楠木为“神木”，封产地之山为“神木山”，建神祠岁岁祭享，以答谢神的赐予。随后又命人开山修路，疏浚河道，将这批木料由京杭大运河经通惠河辗转运抵京城，专贮东郊通惠河畔，这个地方因此叫做“皇木场”。皇宫和长陵工程营造完毕，特留存一根巨大的金丝楠木以应“东方甲乙木”之说作为镇城之宝，并设官兵守卫，以昭示久远，保国泰民安。这根巨大的金丝楠木长6丈有余，相传当时两个人骑在马上隔木而立，谁也看不见谁，可见直径之粗。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三月，弘历皇帝亲临此地视察，触景生情，书《神木谣》一首并立碑，将诗刻在碑的阳面，将他所作的另一首诗刻在碑的阴面，又在“神木”西侧建红墙黄瓦方形碑亭一座，还构筑了七间相连瓦木结构房屋把“神木”覆盖起来，周围用青石栏杆围护，以避风雨侵蚀。

《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九载有乾隆二十三年御制《神木谣》：都城东有巨木焉，其长六十余尺，卧於地，骑者隔木立，弗相见也。相传前明时所置，以应甲乙生气云。作《神木谣》：天三巽一含精腴，深山大泽连林扶。寿灵椿忘荣枯，所乐不存履弃乘。远辞南海来燕都，甲乙青气镇权舆。是称神木众木殊，春明旧迹久闻予。便中一览城东隅，长六丈余卧通衢。围乃不可规矩模，岂然骑者能蔽诸。四百春秋一瞬夫，雨淋日炙风吹敷。枝干剥落摧皮肤，隙孔真菌菌郁纒纤。为想怀材昔奥区，凌云概日垂扶疏。翩翮不胫曰人乎，天也将以为贞符。试看虚中巨查如，尧年贯月历劫余，生育盛德齧皇图。乾隆戊寅春三月御制并书。

1952年，北京钢琴厂在此选址建新厂区时，《神木谣》碑亭和储大木房屋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御碑被埋于地下，而当年的“神木”更是腐朽得不成样子。1985年北京钢琴厂进行技术改造，将埋于地下而得

以保存完好的《神木谣》碑挖掘出土，重新安立于厂办公区西北侧，并为之修建碑亭，周围栽花植树。只可惜当年“神木”已在“文革”初被毁，仅存的几块

原木残片至今仍保留在星海公司厂史展厅内。

据北京钢琴厂1994年印制的《北京钢琴厂志(1949—1992)》记载：北京钢琴厂位于百子湾路黄木场6号，东与北京啤酒厂毗邻，西邻北京市酱油厂，南面是北京内燃机总厂，北靠京秦铁路和通惠河。厂区占地面积61950平方米。该厂始建于1949年6月1日，初名“人民艺术服务社”，社址在东单区冰碴胡同5号。1950年更名为“新中国乐器工厂”，厂址迁至东单区东安门大街19号，后又迁至西四区太安侯胡同17号。

1952年8月开始在九龙山皇木场筹建新厂区，年末迁入，1953年更名为“北京市乐器厂”。1977年北京乐器厂一分为二，分立成北京钢琴厂。1990年拥有职工1551人。1994年改制为北京星海乐器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32965万元。2003年4月，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在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科创东五街8号开始兴建星海工业园区。2004年7月，黄木场6号国有土地64020.21平方米使用权转让给空军某部，用于兴建星海工业园区。之后，空军某部连同北京市酱油厂转让土地，开发为“御宸上院”小区。原北京钢琴厂区内，除《神木谣》碑保存外，其余建筑均予拆除。原厂区南部现保留二栋砖混结构北京钢琴家属宿舍楼。

庆幸的是，北京钢琴厂西侧的北京市酱油厂还保留有完好的厂大门口楼。我看到门楼左侧清晰书写的厂名“北京市酱油厂”“北京市味精厂”，仿佛又闻到金狮酱油的醇香。

据《北京志·商业卷·副食品商业志》记载：北京市酱油厂始建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前身是日伪时期由野田株式会社于九龙山建立的酱油厂，产品主要供应军需。日本投降后，由北平市政府公用局接管，改称市管第二酿造厂。1949年北平市军管会接管，定名北平市企业处第一酱油厂。1952年始称北京市酱油厂。1957年注册“金狮”牌，并开始生产味精。80年代，“金狮”牌高级酱油、“丰收”牌味精曾获市优、部优产品奖，并连续多次评为“北京市名牌产品”。

1985年拥有职工1078人。1990年年产酱油30181吨，味精934吨。1993年，被国内贸易部认证为“中华老字号”企业。2004年迁往怀柔雁栖经济开发区后，与创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龙门食醋酿造公司组建为“北京二商金狮龙门食品有限公司”，现属二商集团六必居集团公司。

北京市酱油厂原厂区除大门保存完好外，厂区院内后面尚存一座砖混结构办公楼；厂区南端有与北京钢琴厂合资建设的职工宿舍塔楼两座。3号塔楼顶端有醒目的“金狮酱油”和“星海钢琴”广告标识。

北京钢琴厂东侧原为北京啤酒厂。约2003年转让土地使用权，厂区内的厂房除西北角的锅炉房改造为“二十二院艺术街区”外，其余全部拆除，由房地产商开发为“苹果社区”。北京啤酒厂位于百子湾路32号，始建于1938年，原为日本人在王府井大街130号建立的北平麦酒株式会社。1940年在九龙山租用土地建设啤酒厂，1944年竣工投产。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北平市公用局接收。1949年由华北酒业专卖公司接管，产品改用飞马商标。1953年改用“北京牌”。1957年啤酒产量5500吨，1966年增至9135吨。1980年实施一期扩建工程，1981年产能达到35000吨，部分保障了北京人酷爱饮用啤酒的需求。1984年试制生产“天坛牌”啤酒。1988年12度“丰收牌”北京啤酒获第十三届巴黎国际食品博览会金奖。1990年有职工1262人。1993年与香港中策啤酒有限公司

合资，成立北京中策啤酒有限公司，保留北京啤酒厂母体。1995年，与日本朝日啤酒株式会社、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合资，成立北京啤酒朝日有限公司。2003年迁往怀柔，在有“北京水源”之称的怀柔区建设新工厂，成为一家拥有先进环保技术的绿色新工厂。2004年4月底，新工厂正式竣工投产。新工厂地处北京怀柔区雁栖工业开发区。总占地面积16.7万平方米，引进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啤酒酿造技术，专业生产地道的纯生啤酒，是目前国内首家实现全线产品均为生啤的厂家。2007年，北京啤酒顺利完成二期扩建工程，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

如今，只有居住在北京钢琴家属宿舍楼的年长者还能说清楚“皇木场”“神木谣”“金狮酱油”“北京啤酒”及北京内燃机总厂的一些历史痕迹。而居住在“苹果社区”“御宸上院”的人们大部分不知道百子湾路、黄木庄的来历及故事。百子湾路西段东头、位于百子湾路28号院东侧的铁路专线，是以往经北京一轻工业局仓库至北京啤酒厂和北京内燃机总厂的铁路专用线。锈迹斑斑的铁轨向人们默默“诉说”着昔日北京黄木场地区啤酒厂、北内、酱油厂、钢琴厂的辉煌业绩。

（李忠义）



积极推动北京老城实现整体保护 努力创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古都，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为了传承好中华文脉，擦亮北京的历史文化“金名片”，近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北京文博人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古城保护、文物保护及视察北京系列讲话精神，围绕城市发展规划和功能定位，创新思维、抢抓机遇，积极推动北京老城实现整体保护，努力创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老城保护呈现出良好发展局面。

一、围绕城市发展规划和功能定位，加强老城整体保护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1. 立足历史文化资源，树立正确的老城保护理念 北京老城，是指明清时期北京城护城河及其遗址以内（含护城河及其遗址）的区域，也就是目前北京市二环路以内的区域，从地图上看是一个“凸”字形的轮廓，总面积62.5平方公里。北京老城是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地区，虽然占地面积只有北京市市域面积的0.4%，但是不可移动文物数量多，历史文化遗产的等级高、价值大，呈现出以皇家宫殿、王府、衙署、坛庙建筑、皇家园林等为主体，以胡同四合院为衬托的规划布局和资源特色。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秉持正确的古城保护理念，即切实保护好其历史文化价值。”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指出，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要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北京市文物局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树立正确的老城保护理念，依托北京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提供战略支撑。

2. 健全机构组织架构，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为保障老城整体保护各项工作能够扎实落地、切实推动，2017年，北京市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挂帅的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并下设老城保护专项工作组，由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与北京市文物局共同牵头，在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各项重点任务工作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 严格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统筹推进老城整体保护

北京逐渐形成以城市总体规划为统领，历史文化名城规划、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划等共同构建的完整规划体系，使北京的老城整体保护工作有充足的保障，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保护的内容。近年来，北京市严格落实“老城不能再拆了”的要求，市委、市政府部署编制了《首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老城整体保护规划》，积极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加大老城文物保护力度，相继启动近百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工程，推进胡同和四合院、会馆、名人故居等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基本完成全市市级及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修订工作，初步形成老城整体保护规划阶段性成果。

二、抢抓机遇，积极作为，老城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1. 文物保护资金投入逐年加大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市级财政拨付文物保护事业经费累计达52.8亿元，实施项目2000多个，其中涉及老城范围的文物保护单位比重逐年增加。近年来，市级财政每年拨付10个亿的历史文化名城资金支持全市文物工作，老城是重点支持和关注的区域；同时区级转移支付资金中每年也分别安排东、西城区各1个亿用于辖区内文物保护工作。

2. 文物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标准化轨道 十八大以来，北京市颁布实施文物相关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共9部、地方标准14项。特别是2014年全国第一部省级地下文物保护专门法——《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的颁布实施，使得全市范围尤其是老城的地下文化遗存得到更加有效保护，与名城及其他不可移动文物法律法规，共同构成覆盖全城范围各类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完整法规制度体系。

3. 文物管理力度加大，文物修缮工作硕果累累 近年来，市、区两级文物行政执法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执法检查和安全巡查上万次、责令改正500余起，发现文物险情及安全隐患及时督促管理使用单位整改。2012年以来，北京市继续实施故宫、天坛等世界文化遗产维修项目，加大老城内革命文物保护力度，先后开展了革命文物资源摸底工作、天安门城楼及城台等重大修缮任务，修缮大栅栏劝业场等近现代代表建筑。

三、创新思维，活化利用，老城和谐宜居水平显著提升

1. 注重历史文化街区风貌管控，促进老城有机更新 近些年，北京市坚持名城保护与更新并举，探索出“渐进式、小步走，微循环”等模式，制定了历史

◆主管单位：北京市文物局
◆编印单位：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
◆主 编：祁庆国
◆发送对象：北京市文博工作者
◆印刷单位：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准印证号：京内资准字9919—L0023号
◆2019年第6期（总第266期）
◆2019年12月31日印刷
◆印数：2000份

文化街区风貌保护管理导则等相关技术规范，建立了全市的街区风貌保护管控体系，改善了居民生活，完善了基础设施，提升了老城街巷整治水平。北京市文物局在2018年编制了《北京中轴线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也促进了中轴线周边整体城市和沿线街道风貌环境管控、文物周边历史环境保护等工作的科学有序开展。

2. 积极探索腾退后文物利用方式 北京市文物局认真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实施工作方案相关任务，在与市相关部门共同探索推进老城整体保护中文物腾退工作的同时，指导各级文物部门积极开展文物腾退空间的合理利用研究。万松老人塔“砖读空间”、正乙祠戏楼等实践经验，西城区《关于促进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管理的若干意见(试行)》的政策探索，什刹海、南锣鼓巷等地区“文化遗产+旅游”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成效突出，极大提升了北京老城活力，使其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地区之一。

虽然北京市老城整体保护的共识和力度不断加强，但减量提质、老城传统风貌保护、精细化治理等方面仍然面临相当的压力和问题。洛阳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古都、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在传承弘扬古都文化、构筑文化高地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成功的做法和成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下一步，北京市文物局将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继续落实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文物保护法》《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的要求，加强与兄弟省市的沟通、学习，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古城价值研究、保护理念提升、保护政策完善、保护措施进步等方面进行探索、交流，共同做好老城整体保护工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关怀下，古老的北京城正在展现无穷活力，留存在京华大地的民族文化瑰宝正在迸发勃勃生机。北京文博人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进一步挖掘老城文化内涵，传承历史文脉，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添砖加瓦，与业界同仁一起为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本文系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凌明在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上的发言，文字略有删节。市文物局老城保护处供稿。）

《永安观宗祠记》与《永安观庙产碑》浅析

今清华大学校内旧有一村庄名为西柳村，王国维逝后即葬于该村。该村原有一座庙宇名为永安观。《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第145页有一份《永安观宗祠记》，第90册51页有一份《永安观庙产碑》，两份拓本可证晚清太监与道教的关系。

《永安观宗祠记》碑额题：永安观宗祠记。正文如下：

永安觀新建宗祠碑記

光緒紀元之二十年，白雲觀護謨化主秋樵劉大師營建柳村永安觀，築削、丹雘，□□□繁，甚盛事也。功既竣，爰作崇德報功之舉。葺祠宇而新之，饗祀時饗，各立生位，以雲溪高律師齒德並尊，推居首列；次之者素雲劉師，雲純夏師，或以事舉，或以言揚，皆眾所心悅誠服者也；又次為呂重如，為張仙籌，為董成五、任瑞芝、劉子慧，而以路子羽仙、劉子林泉殿焉，之數子者合志同方，交相淬勵，與秋樵結契有年，弗渝終始。秋樵舉不避親，並祀於一室，足以見其誼篤友朋，交深道義矣。秋樵少有大志，迥絕恒流，長乃肆力於道家之學，精內典，識宗旨，於律堂法派，貫徹靡遺。又能本太上功德之訓，惠濟群黎，佈施無算，而於同道者延攬尤殷。其興修是觀也，仿常住之例，令道友誼經焚修，接待大眾，供養十方，布地捐金，不少吝惜，同志中姿質歧異根柢深固之士，罔不特加敬禮，共證淵源。觀后創設塔院一所，植樹建塔，俾化者歸真於其間，蓋與祠相輔而行，恐其或有缺憾也。夫秋樵之見義勇為，樂善不倦，昭昭耳目，無待贅言，獨其天性之厚，友道之敦，尤有非人所可及者，因公議以秋樵生位列祀夏師之次，而代述其立祠梗概，如此底后來者聞風興起，體秋樵之心，即以廣秋樵之功也。夫是為記。時在丙申春季穀旦同道公立。

《永安观庙产碑》无题名，正文如下：

□合同永安觀開山住持劉守智、監修首事劉德海會同村中首事陳瑞公立送廟產字據事。茲因德勝門外距□五里西柳村舊有古廟一□，佛殿三層，配房六間，年久失修，被風雨折殘，殿宇坍塌。余不忍坐視，於光緒十七年冬，商酌合村議於重修，眾首事據甘結一紙，交余收存，由余自行辦理。十八年春正月，擇吉開工，落地重修山門、關聖帝君殿三楹、娘娘殿三楹、佛殿五楹、東西順山祠堂各一間、前后東西配房十八間、東西過道各一間、東廚房四間、西庫房四間、鐘鼓樓二座、旗杆二架。西院松鶴軒三間，□□□南房三間□□□□□、廟前女牆周圍大牆、五聖祠一座、廟后義地、周圍群牆門戶俱全，看守瓦房五間、土房一間，廟內外並義地樹株栽植齊整。是年秋八月將永安觀全工告成，吉日開光□神，維置道友留□單據眾。廟內舊有香火地十四畝，例年添置地畝列后：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置韓姓地十二畝；十八年八月十一日置廟前□□□□，又買廷有施助地二塊，作為廟基；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置石姓地一畝；余二十一年二月置李姓地三畝；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六日置馬姓地一塊，作為廟基；二十□年九月初三日置廟后劉姓地一段計地二畝（鑿去約40字）。庚子兵燹后，選出首事人陳瑞等六君幫同辦理，迄今十年矣。維思廟宇清淨之地，非貴觀經理，曷克久遠。余等同心情願將永安觀送於白雲觀永遠管理，以為香火萬年，□立規則十條：（鑿去約90字）一、現將西院修理齊整，秋樵移居其內，另立門戶，自起

火□，不幹□□□□。一、（鑿去約38字）一、廟內祠堂二處永遠奉祀，不得更改。一、廟內香燈、奉經功課俱照貴觀規矩。倘有匪徒騷擾，折毀廟宇，霸持地畝，貴觀認真辦理。一、貴觀派來住守之人，或道或俗，倘有不守清規，確有實據者，準首事知會貴觀，由執事自行查明懲辦。一、本村議事，或立自治局，或立學堂，均著在山門殿前東西配房安設。一、廟內不準招租買賣，即閩雜人等除進香了願以外，一概不準入廟，尤不準招外國洋人教士。一、廟內上項須事，故會同本村首事商酌辦理，否則聽其自便。

以上規則條例於宣統庚戌九月十六日公同白雲觀方丈劉君林泉在佛祖駕前焚香祝告，立字畫押，自此永無反悔。公送後，惟願貴觀執事諸君善為管理，志如堅石，始終惟一，莫負重托。佛祖幸甚。貴觀幸甚。余等幸甚。合村幸甚。立合同後如有僧道以及他人□論等情，俱有立合同人一面承管，將此勒碑刻銘，永垂不朽，遺裕萬年。開山住持劉守智，監修首事劉德海、陳瑞、芮恒□，首事人陳□、□□□、毛海、賈永□

宣統二年九月十六日公議同立

这两份拓本的核心

的人物都是刘守智（秋樵）。据尹志华研究,“刘守智（1849—？），戒名至智，字秋樵。光绪八年（1882）在北京白云观受戒于高仁峒。据前引该年传戒的《登真策》，刘守智系京都顺天府大兴县人，在文安县东关外关帝庙出家，度师夏信齡，为全真随山派传人。小柳司气太

《白云观志》所载白云观祠堂神位中，称其为‘白云堂上第廿一代监院上至下智秋樵刘大真人’。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受戒弟子范德寿所领受的《初真戒律》中，刘至智为传戒的提科师。……光绪二十九年（1903）时，北海总管刘守智、掌仪司首领郭进祥担任万寿兴隆寺住持。可知刘守智也是清宫太监。北京白云观保存的刘守智画像，与刘得印画像一样，均无胡须，也可证明刘守智是太监”（尹志华：《清末太监与道教》，《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另外在宣统元年（1909）《兴隆寺捐资题名碑》中有“总管刘守智助银壹佰两”，尾题“住持人刘守智”（《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90册,30页）。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永安观《寺庙登记条款表》中记

载权利取得原因为“刘得智送”，权利取得之年月为“宣统二年”，1936年《寺庙概况登记表》中记载永安观为“清宣统二年刘秋樵名得智送”（北京市档案馆J002—008—00567《北郊区永安观道士陈明霏关于登记庙产发放凭照的呈文及社会局批示》），由此可知刘守智俗名得智。

这两份拓本揭示的核心问题是晚清太监的养老问题。信修明《宫廷瑣记》中记载：“清代太监养老组织有二：一是当和尚或当老道，一是加入养老义会。太监之有信念者，差不多皆在寺观中挂一和尚、道士名，积蓄资财，作老来归宿之准备。有志者联合同类多人，创建自主之寺观，开山传派，延长本门之香烟，结宗传代。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其纯粹养老者，庙亦有二：一在北平市北长街万寿兴隆寺，一在平西黑山护国寺。此二寺之庙规相同，住持皆由公推，凡入会，须有人介绍。”信修明说到的两种养老组织，刘守智都参与了，他是万寿兴隆寺的住持，同时投身全真龙门律宗，在光绪十八年（1892）修缮了永安观，成为开山住持，使庙产增加，甚至当了白云观的监院。

《永安观宗祠记》是为刘守智记功，在观中设立祠堂崇祀建庙诸人，应该是仿白云观内的祠堂而来。碑记中提到的云溪高律师就是白云观的方丈高仁峒，号云溪。素云刘师就是晚清知名的太监刘诚印。刘林泉是白云观第二十一代律师刘至融，曾任白云观监院、方丈，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中有记载，其他几位不详，能动员如此重要的人物，并充任主持募集传戒经费的“护坛化主”显示刘守智不凡的运作能力。刘守智修寺的目的如信修明所言为养老，“植树建塔，俾化者归真于其间”，则兼具墓地的功能。

宣统二年（1910）的庙产碑主要讲将永安观送与白云观，永安观也就成了白云观的下院。永安观虽由刘守智筹资修繕,作为开山住持,但仍要首事人“帮同办理”。此时刘守智已经年老，精力不济，所以才将永安观送与白云观。订立规则,写明房产及地亩数,就是防止日后合同各方产生纠纷。作为永安观开山住持及白云观监院的刘守智将此观送与白云观，有白云观做靠山自然能够充分保证他的权利，这在规则中有明确规定。村中首事人也维持了在庙中进行公共活动的权利，又有白云观这样的知名官观进行管理，对他们也并无坏处。

（张鹏飞）

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刊物。每年发行六期，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建筑调查新发现，考古工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活活动，学术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作者风采。

为增进全市文博行业的交流，使大众对文博行业有进一步深入了解，欢迎各文博单位及文物爱好者赐稿：

◆稿件以800字以内为宜，图文并茂，并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为：bjjwzb2005@126.com

特别说明：2016年2月,《北京文物》编辑部已注册开通微信订阅号“北京文物报”。自2016年3月1日起,所有通过审阅的稿件均可能通过本刊的微信平台在网络上传播。若作者不同意稿件在微信平台使用,可在向本刊投稿时做出说明;若无相关说明,即视为同意。

征稿启事

《北京文物》由北京市文物局主管、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主办，是一份面向全市文博工作者发行的内部刊物。每年发行六期，主要栏目有：

◆文博要闻：文物工作重要会议、重大决策。

◆博物馆资讯：北京地区各博物馆举办的展览、讲座等文化活动。

◆文物调查：对北京地区可移动文物及文物古建筑调查新发现，考古工作发掘成果。

◆学术沙龙：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活活动，学术理论和学术动态等。

◆职工活动：全市各文博单位职工文化活动。

◆文博茶座：普及文博有关常识。

◆文博人：展示文博工作者风采。

金代赵珪墓，1964年发现于房山区张坊镇广禄庄村,墓已毁,只出土墓碣一方（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北京分册（下）》,2008年,第292页）。赵珪墓碣现藏于首都博物馆，拓片刊布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墓志拓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67页。该书称赵珪墓发现于1958年），墓志录文见于《全金石刻文辑校》（王新英辑校，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357页），但文字与标点都有错误。对于赵珪墓碣的研究以往很少，只见一篇短短几百字的文章（明智：《金赵珪墓碣》，《首都博物馆建馆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171页），主要对赵珪所任商酒



人说：“你们这些学外语的总是习惯写欧化长句，叫人看起来费劲。你去好好地、仔细地看看《红楼梦》，里面有没有像你写的这样长句子？！”他不仅态度严厉，而且声音急切……让我吓了一跳，自满情绪马上收敛了，而且立即感到惭愧起来，的确欧化文句，不仅冗长，而且念起来不顺口，完全不合汉语的路数。他接着说，他不是否定外语与译文，既然是译文就必须“信、达、雅”，保存汉语的特点，尤其是中文译文，一定要按照汉语的语法，通俗简明。沈老师这一席教诲，让我终身受益。此后我在几十年的英译中与俄译中的生涯中，一律不用欧化句子，跟别人审译文稿时，也恪守师训。记得有次受教于朱光潜老师，将英文诗集《金库》的诗句译成中文诗句时，我将外国诗人写的“人的生命是一种不能永存的物质”，译成“人无金石寿”，还受到朱光潜老师的好评。

我是1947年在武汉考区考上北京大学文学院西语系，根据早年蔡元培校长的遗训：国文是文学院各系的必修课,因此我在西语系（学习两年，后转俄语系学习4年）前后学外语6年，其中1948年在北大必修国文课中，直接受教于沈从文老师。

沈老师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当年46岁时在北大受聘为国文教授。听说他青年时曾入伍当兵，想必他是一位身材伟岸的赳赳武夫。见面后才看到他中等身材,上课时穿着灰布长袍,非常朴实，给人印象和蔼可亲，完全是一位文质彬彬的文人，对学生轻言细语，略带湘西口音。得知我是湖南长沙人，更以同乡学生视我，相互之间甚至以湘语交谈。

沈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下课后叫我单独留下，拿了我写的一篇作文，亲切地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呀！”我听到沈老师的夸奖，非常高兴，不料正在有些得意时，他突然变了脸，十分严肃

务官进行了介绍。

鉴于赵珪墓碣对于研究辽金时期北京地区一支赵氏家族具有重要的意义，且墓碣本身文字不长，本文在对墓碣进行重新录文后（录文中“/”为换行符），再略加考释。

趙公之碣/

今之世祿，翻覆于浮雲。嗟呀，可成其嘆矣！富貴/聊圖戲爾。浪擲功名，百歲都來，倏忽謾成虛役。/烏呼！想人身患化如石火風燈。丙天壽,福勝明,/期之默約。有涑州司侯司西南廂住人趙珪，丙天壽四十有三。受帝敕敦武校/尉，新受涑州馬城縣併城鎮商酒都監。哀哉！/不幸，明昌三年十月初五日于平山以身故，遷/即今壬子年癸丑月丙午日辰時大葬。/右銓三代：/曾，官封岩州刺史趙公。/祖，銀青光祿大夫、澆南軍節度使趙公。/父，修武校尉、行中都鐵場使趙公。/

今建墳於涑州奉先縣白玉鄉南抱玉村，記耳。/明昌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右謹立石者：/妻張氏、長男興祖、女子瓊枝、次女瓊瓊。/右謹具如前，建碣於墓側。

墓碣记载了赵珪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的官职，虽然没有名字，但从三代的官职，正好可以将赵珪判断为赵好古之子。据赵好古墓志（参见拙文：《金代赵好古墓志考释》，《北京文博文丛》2018年第4期），赵好古官职为“修武校尉、中都铁院都监”。中都铁院都监就是中都铁场使，也就是《金史》中记载的镀铁院都监。赵好古的父亲赵颺“资至光祿大夫，沁南军节度使兼怀州管内观察使”，也就是赵珪墓碣提到的“祖，銀青光祿大夫、澆南军节度使”，只不过墓碣的撰写者将“沁”错写成了“澆”。赵好古的祖父赵鹤年“资至商州刺史，知岩州军州事”。也就是赵珪墓碣提到的“曾,官封岩州刺史”。

赴美国华盛顿,委派担任“北京历史文物展”的翻译，第三次是1991年代表北京燕山出版社赴苏联莫斯科办书展。因此有个别外国人通过我这位熟人，去找当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老师鉴定古代服饰，沈老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和一位外籍人士，对古代服饰（仅一件）作了鉴定与说明。但临时时沈老师拉我到一旁，悄悄对我说：“楊冰，下次带外宾来找我，一定要开介绍信！”这句话提醒我外事工作无论大小都要按程序、守规矩，事情再小，也不能轻举妄动。

此后，一直到1988年沈老师逝世，我未曾与沈老师见过面，也未曾到湖南凤凰他的墓地去祭奠留影。但我特地保存他的文集，一套12册，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与花城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敬置案头，不时拜读。

2016年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梁丹同志弥留之际，曾嘱其夫人约我到他家整理藏书，以备捐赠局资料中心，也嘱赠我二三本图书。我突然发现有沈老师所著《龙凤艺术》，便要了作为纪念。此书196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仅115页，印数1万余册，因在国家困难时期，纸张黄而粗糙，从目录内容看，全是文物艺术考证文章，论述十分精辟，体现了沈老师在文物考古方面（特别是古代服饰）达到的高超成就。也曾听说他在 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经常“屈尊”为中小學生观众担任讲解员，可见他对青少年的关爱。

此外，我十分敬重沈老师生前在他将逝世时写下的墓碣: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沈老师享年86岁，离开我们已30余年了。墓碣是他一生的最确切的总结和评价。沈从文的为人与事业永垂不朽！

（宋楊冰）

因此，据父子两代的墓志、墓碣及《金史·赵颺传》，我们可以复原出辽、金两朝赵氏家族六代的世系：

赵元佐→赵鹤年→赵颺→赵好古→赵珪→赵兴祖另外，两方墓志、墓碣记载的墓主生卒年也可勘同，也说明赵好古、赵珪确属父子无疑。赵珪墓碣记载他卒于金明昌三年(1192),享年43岁(应为虚岁,下同),则他生于金天德二年（1150）。赵好古墓志载,在他于金大定三年（1163）病故时,“年二十九卒,所生一子，小字和尚。年一十四岁”，此子正是出生于1150年，也是说“和尚”就是赵珪的小名，赵珪尚有两个妹妹孀姑、善阳。赵珪的后母也就是赵好古的续妻育有两子，不得其名。

墓碣之所以记载赵珪是“涑州司侯司西南廂住人”，很可能与赵氏家族后世子孙包括赵珪本人在内的败家有关。据《金史·赵颺传》，在其父赵好古死后的数年，也就是其祖赵颺死后的十多年，“颺子孙、司徒张通古子孙皆不肖淫荡，破资产，卖田宅。世宗闻之，诏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没，子孙不得分割居第，止以嫡幼主之，毋致鬻卖。’仍著于今”。正是因为破产，变卖了田宅，所以赵珪才不得不开中都大兴府，来到生活成本更低的涑州（今河北省涑州市）居住。金天辅七年(1123)曾以平州为南京。赵珪死在距离涑州几十公里的平山，也就是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很可能也是出于谋生之需，到处奔波之故。最终，他很可能是因为祖父的荫庇，而得到和父亲一样的商酒务监当官之类不入流的官职，但却没来得及上任就病故了。

赵珪所葬地“涑州奉先县白玉乡南抱玉村”，即今天的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广禄庄村，应该就是赵氏家族祖塋所在，不知具体出土地点的赵好古墓志也应该出土在此。

（周 峰）